

儿童近视治疗市场乱象： 有患者训练后度数反而变高

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居高不下,已成为我国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而孩子近视后,家长普遍不想让孩子马上戴眼镜,于是,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尝试各种所谓的视力康复“治疗”。这些所谓的视力康复“治疗”可信不可信?孩子视力“好转”的背后藏着怎样的猫腻?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走访。

培训老师代替专业医师

家长对孩子的近视问题尤为担心,而这也给很多所谓的治疗近视的机构以商机。

一个月前,北京市民车影的女儿被检查出近视,因为担心眼镜片越戴越厚,车影带着女儿走上了治疗近视之路。

不做手术一个月摘掉眼镜,百分百恢复视力,某视力恢复中心的宣传标语吸引了很多家长,其中也包括车影。

这家视力恢复中心位于河北,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介绍,其中心使用的是降度镜,“我们这边一个店100多个孩子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恢复的”。在随后的交流中,工作人员还向车影发送了治疗中心的视频,画面中几个孩子戴着治疗仪器一字排开,仅有一名未穿工作服的成人在一旁照看,并没有看到医生。这让车影对这家视力恢复中心的专业性产生了质疑。

“工作人员说医生会在周末来坐诊,是石家庄和邢台的市级眼科医院主任。”车影向记者回忆说,“工作人员称,普通眼镜只会越戴度数越高,而降度镜会越戴度数越低。后来我再次问治疗全程是否有医生陪同,对方只是说会有老师接待和陪同”。

这样的回答还是不能消除车影心中的疑虑。“视力恢复中心的老师是治疗近视的主力军,老师是哪里的老师?有哪些资质证明?”在考察近视治疗机构过程中,车影发现,几乎没有一家机构能够明确对老师的专业性和医疗辅助水平作出详细说明。

车影告诉记者,位于北京市西三旗的一家视力恢复中心自称是全国连锁,总部在沈阳,老师都是经过总部培训的。面对车影关于“老师是否有医师资质”这一问题,工作人员的回复则是:“我们的老师都是经过培训的,我们采用的是物理疗法,依靠按摩,不手术。”

“不手术就不需要医师资格,这样的思维在视力恢复治疗机构并不少见。这些机构的培训老师是否应该具备专业医师资格、采取的治疗方法是否有科学认证,我问了一圈下来也没有得到答案。”车影无奈地说。

治疗方法产品五花八门

此外,记者在调查中还注意到,儿童近视治疗市场还出现了苗医、中医针灸等治疗视力的方法,此类机构在全国范围内招加盟商。

然而,在加盟过程中,这些机构对加盟者几乎没有医学背景上的要求,也没有相关的医师资格的门槛和培训。当被问到安全问题时,招揽加盟商的相关机构工作人员解释说:“我们不动刀,不接触孩子的眼睛,只是教给孩子方法,没有风险。”

在考察过程中,车影发现,除了不动刀以外,视力恢复中心的治疗方法五花八门。比如,依靠仪器的治疗机构推出的产品包括角膜塑型仪、降度镜、护眼按摩仪等。

至于治疗方法,相关机构的工作人员也说得云山雾罩。

在一家自称通过物理方法恢复视力的视力康复机构,其工作人员对车影解释:眼镜度数和视力是两回事,度数是永远不会恢复的,但视力可以恢复。“按照工作人员的说法,经过治疗,孩子的度数不会降下来,但是就算近视200度的孩子也不用戴眼镜,只是需要调节眼睛的恢复能力。”车影说。

一些方法违背近视防控原则

那么,通过训练真的可以让使用者感到“不戴眼镜时视物变清晰”吗?

杭州艾凯眼科主治医师罗荃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方法是通过训练使得相同近视度数的人测出了不同的视力,其原理则是来自于“大脑的模糊适应现象”。

“我们的视网膜在焦点处成像是最清晰的,但在这个焦点前面和后面的一小段距离里,成像也是相对清晰的。如果视网膜能接收到这段焦深范围内的光线,大脑也会识别为清晰。”作为有着众多读者的自媒体“罗荃聊眼睛”的作者,曾对近视康复进行过专门研究的罗荃向记者分析说,大脑对不清晰是有一定容忍范围的,只有超过了这个范围,我们才会感觉到不清晰,“这就是视力训练有效果的原理,它起作用的地方根本不是眼睛,而是大脑”。

罗荃进一步解释说,大脑不断地适应模糊的视觉后,这段可容忍范围扩大,原本大脑认为不清晰的东西也会变得清晰,于是视力就提高了。只是,这一切适应都要建立在模糊的前提下。

“一旦戴上合适的眼镜,视觉突然变清晰了,聪明的大脑一定会选择最清晰的范围看,把原来能容忍的那些模糊影像全部抛弃掉。所以,这样的机构一定不会让患者佩戴合适度数的眼镜,否则他们也就一秒破功了。”罗荃说,为此他们也摸索出了最有效的说辞,那就是——戴了眼镜就摘不下来了,恰好击中了很多人内心的想法。

对于目前市面上各种各样的视力康复机构,据罗荃介绍,一些所谓的视力康复机构由于没有系统的理论支持,采用的方法五花八门。

“其中很多训练方法需要高强度用眼,与减少眼睛疲劳的近视防控原则背道而驰。许多患者训练后视力好像变好了,但近视度数比原来还高。慢慢地,近视加深到一定程度,超过了大脑能容忍的范围,就再也看不清了,视力就会断崖式下降。”罗荃说,而相反,针对弱视、视功能障碍等患者开展的视觉训练,有一系列规范的方法。这类训练也有可能提升视力,但绝不会拿“降低度数”作幌子。

(据新华网)

插画:胡兴鑫



当年直接包产到户怕犯错误 汤道全就先“包产到组”

1978年11月的一天,24岁的汤道全蹲在田头,苦苦琢磨着如何才能让全队队员不挨饿熬过这个冬天。

其时,汤道全是醴陵市茶山镇大西垅村仓下组生产队队长。

其时,远隔千里的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人家聚拢在一起,决定豁出命来也要搞包产到户!

“醴陵当时也有私下搞包产到户的,都被‘要求政治正确’的上级严厉叫停了。”汤道全回忆,改革的春风,两年后才吹到醴陵,吹到大西垅村的。



▲汤道全(右)和儿子汤理在合作社粮仓合影 记者 周蒿 摄

人物档案

姓名:汤道全
年龄:64岁
事迹:包产到户时任醴陵市茶山镇大西垅村仓下组生产队队长

大集体时代： 靠五谷杂粮填饱肚子

“破土屋,漏风墙,两块板子就当床,十家九户都缺粮。”回忆起40多年前的农村大集体时期,今年64岁的汤道全记忆犹新。“包产到户,那是逼出来的!”

当时,刚从部队退伍回乡的汤道全,担任大西垅村仓下组生产队队长。记工分,分口粮,收入由队里统一年终分红……汤道全说,大集体的最大弊端,是生产效率太低。

“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只要有一个人偷懒,大家就普遍磨洋工。”

同时,由于政策不允许,就算是家里有富余劳动力,农闲时也不许搞副业,“怕被割资本主义尾巴。”

与全国大部分农村一样,在僵化的大集体制度下,仓下组村民们饭都吃不饱,几乎每年都有好几个月吃不上米饭,只能靠高粱、红薯等杂粮填饱肚子。

“一年到头,只有过年才能吃到肉。”大西垅村村民文渐育说。

冒险探索： 完成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

穷则思变。1978年,凤阳县小岗村率先实施包产到户,拉开了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序幕。

当时,湖南地区深受“左”倾错误路线影响,领导干部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责任制意见不一。1979年,醴陵有10个生产队暗中搞包产到户,被上级要求坚决纠正。

“看到了包产到户的好处,又担心犯政治错误。”汤道全介绍,在和队员们一起商量后,他想了一个办法:先不搞包产到户,先搞包产到组。

“把仓下组生产队拆分成好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只有几户人,实行小组包干。”汤道全说,这样既不违反政策,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小组成员的积极性。

“完成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汤道全说,实践证明,相比几十户捆在一起的大集体,小组包干后,大家的干劲都有所提高。

土地流转： 从合到分再到合 土地流转带动乡村振兴

包产到户,让农民吃上了饱饭,但当年的“分”带来的改革效应,随着时代的变迁,在逐步弱化。

2009年,汤道全成立了醴陵市农丰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从村民手上流转土地,实行了规模化,从事粮食标准化种植和养殖生产。

“我种了一辈子地,看到村里的年轻人现在都出去务工,很多地都荒废了,舍不得。”汤道全说,自己做生意,在外面跑得多,认定搞规模化种植会有前途。

现在,从长沙岭,沿313省道,到醴陵市茶山镇大西垅村,整整连绕好几公里,涉及三个行政村2000多亩水田,都是汤道全的产业,去年收入达四五十万元。

因实行了机耕→机育(秧)→机插→机防→机收→机运→机烘的水稻全程机械化作业,这里还被列为农业部(醴陵)水稻全程机械化生产示范区。汤道全也被评为湖南省先进种粮大户,他的公司获得了优秀现代农业合作社等荣誉。

2016年,汤道全在上海打工10多年的儿子汤理,选择回到乡村,跟随父亲种田。“改革开放前40年,老一辈农村人从吃不饱奔向了小康,接下来,轮到我们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了。”汤理说。

对话

记者:您觉得包产到户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汤道全:激发了奋斗的动力。以前是干好干坏一个样,包产到户是多劳多得。以前是必须服从统一安排,多养一只鸡都不行,有想法也没办法实践,包产到户后可以想种什么种什么,如果不想种地,还可以出去打工,做生意。每个人的能力都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

链接

包产到户的政策背景

包产到户,最初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由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十八个农户最先开始实行的。作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步,包产到户突破了“一大二公”、“大锅饭”的旧体制。而且,随着承包制的推行,个人付出与收入挂钩,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大增,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民可以将多余的粮食出售,形成了自由市场,农民手上的现金大增,农村经济大为好转。在1978年至1985年间,粮食的增幅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峰,农村出现了一番新景象。

(记者 周蒿)